

第二十期

國際通訊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一個機械的看法

陶希聖

有人主張中國參加聯軍方面，向軸心方面宣戰。這個主張是由於一個機械的看法來的。依於機械的看法，世界上各國分爲兩大陣營。兩大陣營作戰的結果，一方全勝，一方全敗。全勝的方面向全敗的方面提出條件，全敗的方面接受了。戰後的世界便按照全勝方面的命令改造了。大戰的過程既然和壓寶一樣，不是單，就是雙，所以中國應該估定單雙，參加一方面。如果中國參加的這一方面勝利了，中國就勝利了。這種看法，發動了一些人的思考力，都來估量雙方誰勝誰敗，以決定中國的路線。

壓寶式的看法，自抗戰開始時起，就流行着。當時有一些人以爲中國打起來，蘇俄就會打起來，隨之而法國打了，英國打了。其結果德義敗了，日本也就敗了。這個想法，後來被事實證明其不確。今年

四五月間，德軍打敗了好幾個國家，最後一個還是世界殖民帝國第二位的法蘭西。那時候，也聽說所謂「德國路線」引起一些人的考慮。最近英國本部有支持的力量，同時美國竭盡力量幫助英國。兩軍對峙之下，日本既加入軸心，中國自當加入聯軍。要是不然，有一天德義敗了，英美勝利了，中國怎樣呢？這種看法，在兩洋烽火隨德義日三國同盟趨於聯繫的今日，言之却也成理。

中國民族自衛戰與世界列強爭霸戰性質不同，姑且不論。這個壓寶式的主張，在事實上就把單雙估錯了。

法國失敗以後，軸心國一面控制巴爾幹，一面汲引西班牙。除東歐的蘇俄，不接受任何國家外交的擒縱外，自東南歐以至西南歐，大陸上漸沒有聯軍的據點。軸心國一面繼續作戰，一面正在作建設的活動，要把歐陸造成一個自足的經濟區域。聯軍方面同樣的施用種種方法鞏固並增長海上的權力。英國加強大西洋上的海軍，美國加強兩洋的海軍。兩個海權國更漸趨於具體的共同佈置，如美加聯防之類。在這種形勢之下，德義無力打出大西洋，正與英國無法打進中西歐是一樣的。我們對於今後的戰局固然不能預言，可是我們要知道，武力戰勝了以後，戰勝國要鞏固其戰果，比戰勝還要艱難。武力戰敗了以後，戰敗國要持續其生存，經營反攻，並不是不可能，除非像法國雷諾與貝當政府一樣，一打就敗，一敗就降。

戰場的勝敗，並不即是全局的勝敗。中國人尤其容易明瞭。日本軍隊在戰場上勝利了，可是他鞏固戰果的努力，在外交上，以及在佔領區內，都沒有成功。自日軍入境以後，三年之中，他還是在製造各種「既成事實」，想取得第三國和中國的承認。日本如不能擄取中國的承認，如不能擄取第三國的承認，他的戰果是不算數的。日本如沒有力量造成「新秩序」，他的戰果是不算數的。德國在歐陸的情形也

是一樣。

法國敗後，聯軍方面也一樣有處敗的計劃，其努力至少也和德國處勝一樣的積極。今日主要戰場當然是英法之間的海峽。可是英倫三島即令失敗，英國以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印度，南非各地之富饒與廣大，仍然不是沒有立國之道，仍然可以活動於兩洋。要明白這個形勢，才可以明白美加聯防以及英美澳的商量乃至英美在南太平洋想要做些事情的用意。明白了這些以後，我們才可以推論到一個結論。這就是說，德義方面即令再有勝利，也並非就是日本的勝利。日本在太平洋，正是在英美海軍的包圍裏面。英國在大西洋前線的頓挫，只要海軍仍然活躍，則日本無法突破這個包圍，德義仍然幫不了日本多少忙。

除非蘇俄向中東出兵，德義對英的再進一步勝利，很是有限。同樣的，除非蘇俄向軸心開戰，英國對歐洲大陸的進取也很難很難。非單即雙的推論，完全不能適用於今日的歐戰。在這種情形之下，世界的形勢是正在變化的。德義日的「世界新秩序」是與恢復歐戰以前的原狀一樣不容易全然實現。在這種限度以內，聯軍的勝利，並不就是中國的勝利。中國還要靠中國自己。

客觀形勢既不許賭博，則壓寶式的機械看法所推出來的主張，是要不得的了。

第二十期目錄

- 一、一個機械的看法
- 二、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覆亡
- 三、拉丁美洲並不傾向於法西斯主義
- 四、越南與荷印的華僑
- 五、德國國社主義的幾個基本原理（特載）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覆亡

W. H. Chamberlin

本文作者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氏，在法德宣戰前即僑居法國。宣戰後，曾親赴前線視察多次。巴黎失陷時，彼亦隨同避難，故作者對法德戰事，有澈頭澈尾之認識，其中列舉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之腐敗內情，使人恍然於法國迅速覆亡之原因。本文譯自大西洋月刊九月號。

法國的傾覆，必然會像第五世紀羅馬的覆亡，和十五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崩潰一般，轟動着全世界。在全世界文明人的眼光中，從重慶到利馬 (Lima)，巴黎一逕是一個國際上藝術與文學，文化與文明的國都。布拉格與華沙的最後呼聲，在美國人耳朵裏還很微弱。可是當巴黎陷落，不久便是整個法國崩潰的時候，怕連那許多對大西洋隔岸幾個國家，並沒有多少知識與經驗的人民，也一定會感覺到一個比較文雅與開化的世界可以毀滅，而一個新的鋼鐵時代，不單是來到了捷克，波蘭，法國，而是整個的世界。

法國的厄運來得那麼迅速，心上簡直沒有把握它的重量的餘裕。在五月中旬，除掉前線的士兵以外，一般人的生活，簡直不像是一個在作生死戰鬥的國家。店舖裏塞滿了貨物，擠滿了顧客。時裝表演吸

引了成羣的觀衆。歌舞劇、音樂會、戲院，像往常一般的熱鬧。我在回想中間，回顧過去巴黎怎樣直腐蝕到德軍侵佔前夕的情形，真不禁爲之驚愕不止。法國會有頒發每人人口糧卡片的消息，可是除去白糖以外，實際上並沒有實行。那種名義上的關於肉類、麵食與酒類消耗的限制，性質上既屬極端和緩，辦法又很容易規避，即以燈火管制而論，它在英國成爲那末一個有力而確實的提醒戰爭的東西，在巴黎也祇是稍勝薄暗一籌而已。

然後，在一個令人不能置信，迅疾得使人盲目的月份裡，法國便遭遇到很少國家經驗過的毀滅。：有一千萬難民，佔全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盲目的瘋狂的到處亂竄，塞滿了道途，像一羣蝗蟲似的，將非侵佔區的食物嚙食殆盡。德軍在凱旋門與拿破崙墓上放着步哨。：：：巴黎變成一個實際的沙漠，它的整個繁華與熱鬧的生活，彷彿給什麼惡意的符咒作祟，一下子全消失了。：：：德國的裝甲師團，在法國巡行示威，就像法軍在越南或其他法屬殖民地巡行示威一樣，絲毫不受到抵抗。：：：那件指明法國覆亡的休戰協定，或許是使法國永遠不能再躋於強國之列的覆亡。：：：此外艱鉅萬難的復興工作，比較一八七一年的工作，更將困難不知若干倍。

我和法國人是一起體驗過這次出於意料，準備不充分的戰爭的整個悲劇的。我本人便看到四個月的戰爭序幕，八個月的沒有真正戰鬥行動的平靜得令人疑惑的戰爭，然後是六個星期的毀滅的閃電戰爭。我本人也是從德國北部，逃往西南部的巨大難民洪流中的一滴。

我本人便是一個難民，因爲我們夫妻兩個離開巴黎時，除掉手裏攜帶的物件以外，什麼都沒有帶走。我已經認識在舉國瓦解時候，一切生活上的變化；想獲得飲、食、住的極端困難；在許多情形之下，要找到交通工具實際上的不可能；時時會觸起自己會逃不出不久即會變成戰場的城市沮喪思想。我每

晚上牀睡覺的時候，就不敢料定我的避難地方，到了明早是否在一個炸彈下，還會剩留什麼東西。

現在我已經逃出了這個千變萬化的夢魘，——那時每天都要匆促的撤退到離開德國裝甲師團更遠的新地方去，——我提出給自己和讀到我這篇文字的許多美國讀者，回答那個既苦痛而又有魔力的問題：法國怎樣會崩潰的？去年波蘭在德國三個星期的猛烈攻擊以後崩潰，曾引起一度的震驚。不過誰都是那麼相信，這對於一個進步的，軍事上有準備的西方國家，斷然不會再是如此。可是在六個禮拜以後，法國竟和波蘭一樣整個的擊敗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法國瓦解的原因，並不是英、美、法、多數人士對現時戰爭武力真正的平衡，有什麼虛偽，錯覺與強烈的誤解。從戰事開始，我本人便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看到那種不合理的「德國不會戰勝」的態度，不單在英法兩國盛行，可是見解應該更獨立更理智的美國，竟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真是令我又驚奇又害怕。

美國，照我想，顯然是犯了所謂一種舉國弱點的一廂情願的毛病。在粉碎了許多錯覺的德國攻勢以前不久，我曾經和一個美國消息最靈通，見解最正確的美國對歐政事觀察家，有過一次極有興味的談話。

「你知道，」我的同伴說，「無論什麼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德國是如何的強盛，不過同時也指出一兩個弱點，我多半會接到編者囑我另寫一篇，祇將德國弱點予以發揮及強調的覆信。我想美國的輿論已經走入了歧途。因為美國大多數的人民，熱烈的希望納粹失敗，他們便很容易的犯了「德國不會勝」的思想。」

使法國蒙受災禍的錯覺之一，我們可以從法國全國各處戰事圖畫標語上看到；我現在想像，那張標語一定是被帶了種苦痛的嘲笑意味給撕下來了。那張標語是表示英法帝國在全世界的龐大領土，和當時

德國侵佔區域作對比的，上邊印着安慰的標題：「我們比德國強得多，我們一定會勝利的。」

那張標語上所表示的，英法比德國擁有更多的資源，所以英法必能戰勝的思想，多半是由如果希特勒會像聯軍所希望的從事一種長期戰爭而造成的。不過在局勢顯然日趨危急的時候，有一個法國見解最敏銳的政治評論家對我說：「現在有種危險的謬誤思想，那便是祇因為我們擁有更多的天然資源，便應該命裏注定勝利。希特勒的資源是已經調集而且搬在戰場上了。我們的資源，大部還散處在世界各地。它們並沒有變成唯一可以阻止德軍前進的飛機與坦克。我們在一兩年或半年內可以從自己的帝國內，或是從美國獲得什麼，對於在顯然幾個星期內便得解決的一個戰役問題上，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我在英美法的報章雜誌上，讀到多少扼要的，合於邏輯的文章，詳舉世界金、鐵、石油、銅和其他戰略材料存貨的數字，指出慰藉的結語，「德國不會戰勝」啊！當然，那許多事實與數字，是完全正確的；不過這個結論祇有放在長期戰爭的假定上，那纔是正確的。在一個短期的戰爭裏，重要的祇是即時可以應用的人力與物力。

法國便是受了優勢的天然資源，即是勝利的確切標準的錯覺的犧牲。她還吃了過份信賴其他兩種武器的大虧：那便是馬奇諾防線與海上的封鎖。

馬奇諾防線，我去參觀過幾次，是一種軍事工程的偉大建築物。它建築在山邊的用無數重刺網圍繞起來的礮台，可以用大礮與機槍的交織炮火，消滅山邊每一個活動目標。從比國邊界沿伸到萊茵河的正馬奇諾線，如果沒有受到鉅大的或是不能使用的損失，正面來的攻擊，當然是不能攻襲下來的。不過法國和其他國家大部人民忘掉，馬奇諾線祇是邊界上很短的一段。所以在比利時邊境那兒薄弱得許多的防線，一旦被德軍衝破以後，在後方將馬奇諾陣線奪下，祇成了一個時間上的問題——而它的堅固的炮

台，和偉大的地下交通設備，也就像中國的長城一般，變得毫無用處。

封鎖，本來在勢均力敵的雙方，從事一種長期戰爭中的重要，或許是有決定重要性的武器。可是在六月中旬，德軍已進佔了法國心臟的苦痛日子，那對於法國，是絲毫沒有什麼好處的。同樣的，譬如敵軍已經從大西洋開抵密西西比河，並且顯然祇要一個短短的時間，便能完成太平洋岸國家的軍事佔據，美國人當然不會因為法國或聯軍的艦隊，可以在幾年以後將侵略軍隊餓死的事實，便得到什麼安慰。

二

在這兩個錯覺以外，法國更受了總司令甘茂林將軍與國防部長達賴第的無窮禍害，他們兩個是戰前幾年中間，和最初八九個月戰事期間的主要負責人，在法國正需要拿破崙或葛爾諾，（Carnot）那種革命的「勝利組織者」人才的領袖時候，他們兩個却全是難以想像的庸才。我從疲乏的、打敗的、抱怨的法國兵士那兒，再三的聽到同樣懷恨的話說：「我們是被出賣了。是法國的政客將我們出賣的」。

關於高級人員公然賣國的罪狀，迄今還沒有證據。不過甘茂林達賴第和他們的同僚，則有許多和賣國同樣有罪的充分證據——他們完全沒有把握現代戰爭性質的才學，對戰爭又沒有作充分準備。

達賴第簡直是第三共和國常見的庸碌，平凡或中派偏左的政客的一流。他並不是一個軍事專家，可是他自以為在軍事方面有着專家的了不得的才幹。

甘茂林，許多年來法國國防體系的首領和達賴第的一個親密的同僚，可說是現代戰爭——近二十年來科學發明與技術進步所造成的一種革命——最不堪問問的總司令。既謹慎而又守舊的甘茂林，他對馬奇諾防線評價過高的弊病，就像他過低估計飛機與坦克車的攻擊力量一樣。而年青將官像高爾將軍等所

提出的建立特殊機械化部隊，配置相當數量的坦克車與熟練駕駛兵士的計劃，都被他束之高閣而沒有採用。

當法國，像英美一樣，沉湎在可以不必費上大氣力便能獲取勝利的幻想裏的時候，使每一個觀察者感到困難的，倒不是那種一廂情願的思想，而是宣傳與檢查制度，將某幾個大局上困難的事實蒙蔽了起來。有一個很聰明的法國政論家與政客戴亞（M. Marcel Deat），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後，幾乎是單獨的公開反對法國爲了波蘭問題而對德戰爭的政策。他在戰爭的前夕，警告其國人：「今日的法國，並不是路易十四或黎塞留（Richelieu）時代。」戴亞現在大概可以因豫言得那麼正確而感到滿足了罷。

法國近今的崩潰，祇是證明了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所十分明白的，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反變得蒙混起來，因爲當時建立了一個對抗德國的極大團體：原因是單獨法國一國，無論如何不是德意志的敵手。在兵員數額上講，德國對法是二對一，如果將意國人數加入，就變成了三對一。德國的工業力量比法國的更高，或許是四與五對一之比。所以法軍以六十師之衆，在松末河與恩河對抗一百五十萬德軍及十個裝甲師團，作最後絕望的戰鬥時，也就無足驚奇了。

現在歐戰所以不大引人注意的基本事實之一，便是德國在一九三九年所對抗的軍隊，比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要軟弱得多。這次祇有英法兩個強國，被逼負上戰爭的全部重負。在另一方面，在第一次歐戰裏，不必提小協約國，此外美、意、俄、日，都加入了反德的集團。當然，這許多國家並不是在同時發動，也沒有施出同樣的壓力。不過他們對於傾覆德國，都多少有了貢獻。如果東線沒有俄國對德的壓力，或許瑪倫（Marne）那次勝仗就永遠不會實現，而法國在一九一四年，或會像一九四零年那麼迅速的就被擊潰了。

我們祇明白法國受難的軍事原因，將是一個錯誤。這次法國的戰爭，甚至在一種軍事意味開始以前，在外交上便失敗一半或四分之三了。英法對第三帝國的關係，建築在可怕的狐疑，而又瞎摸的愚昧上面。我們現在回想起來，法國沒有在一九三六年對德開戰，或是法國在一九三九年上對德宣戰，這兩件不幸的錯誤，到底那一件錯誤得更利害，我們很難加以判斷。

不用說，在一九三六年德軍重據萊茵區域的時候，法國滿可以單獨擊敗德國的。那時德國大規模的擴軍，還祇在最初的階段。法國的軍隊，可以跨過還沒設防的前線，迅速的開進魯爾與萊茵區域的德國工業中心去。

法國自從失去了這個機會以後，於是便默認德國的向東擴張，希望第三帝國最後會和蘇聯衝突起來，變成了它唯一的合理政策。明興協定似乎宣佈這一種政策是早就採取了的。不過他們總算還沒有充分遠見的現實主義，去堅持這種政策。

最大的謬誤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底給予波蘭的保證。這一種保證，祇有當現在的蘇聯，像一九一四年的帝俄，是英法一個可靠的同盟時，方能發生效力。

可是史太林的全部談話記錄，都是明白聲言蘇聯與英法，是沒有成爲一個全盟國的可能性的。這個亞洲的暴君，憎恨着西方文化所有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東西，當然是很高興看到它的毀滅的。此外，他也完全明白，他的經過多次「清黨」的紅軍，要抵抗德國國防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英法的政治家，却天真到幾乎難以想像的相信，如果英法在東歐阻止德國此後的擴張，史太林便得隨處受到希特勒的飛機與坦克車攻擊了。

在這不能想像的對波蘭的保證裏，便是德蘇公約的胚胎。這份公約，幾乎在戰爭開始以前，便預先

決定了戰爭的結果，因為它給予德國在東方的整個安全，所以德國便可以將武裝軍隊的全部力量，來對付法國。希特勒前時一逕避免的德蘇和解，這次突然成立，顯然是對英法與波蘭締結同盟的一個反擊。史太林看到「資本主義」的國家與法西斯國家，在戰爭裏互相消耗實力，而蘇聯則置身事外，在土地與革命的利益上，或許都能有所收穫，當然是最高興不過的。

現在，史太林很可能的，已發覺到他的渴望第三帝國成爲歐洲唯一大國的期待是錯誤了。不過他的後悔，如果他有後悔的話，對於被打擊得沒有恢復希望的法國是沒有裨益的，對於單獨對抗強敵的英國也是沒有好處的。那許多將法國的政策，造成到德國不打野蠻的蘇聯，反打文明法國的法國人——政客，外交家，政論家，輿論製造者——所負的責任，可說是重大到無可估計。「上帝想毀滅的人們……。」

二

法國的迅速崩潰，可說是對法國政治上許多腐敗情形的一個嚴厲的判罪。黨派的複雜，內閣的短命，黨派的鬥爭與糾紛，財政上不時發生的貪污事件——這一切即在平時都是不能稱爲一種良好現象的。而法國從一九三三年起，當法國的永久敵人還偏處於萊茵以外的時候，便繼續從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澈底而完備的戰爭準備——這使個人主義的與民主的人民，變成了既野蠻而又瘋狂——這對於國力與資源，簡直是一種極難忍受的大消耗。

可是當德國新發現的團結與殘忍，愈來愈快的追及法國從凡爾賽和約上所享有的軍備上的優勢，而且德國最後從劣勢一變而爲優勢時，法國却爲了某幾種不幸的蹇舛命運，益發變得不堪收拾的分裂了。我相信每一個愛國的法國人，當他回顧到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間的鬥爭與分裂，巴黎暴動，人民陣

線時期的暴行，這一連串簡直沒有完結的罷工事件，將法國飛機的生產幾乎減縮到零點的過去，該是多麼痛心啊！

當希特勒的間諜忙碌而又活躍，和他的在「高等社會」裏的特務機關在法國的保守團體裏，推行某種程度的腐化勢力時，在法國的悲慘命運上，造成最大損害的，則是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因為法國國內的共產主義，就像英美的一樣，並不是一種不重要的外國崇拜東西。那是一種羣衆運動，信徒大半都在勞工中間，在國會裏也有着許多代表。

法國共產黨的任務，是遵照莫斯科頒發的欺詐的命令，首先在國內竭力誇張階級的不平等現象，然後是將法國推入共產黨用罷工手段使其毫無準備的戰爭，最後是等到法國真正和希特勒的德國打了起來時，突然來個向後轉，變到失敗主義的路上去了。在戰事爆發前幾個月中間，法國的共產黨是最積極的「主戰派」。他們的機關報，十二分矛盾的叫作「人道報」的，如果有什麼人對於但澤問題，建議可以作一種妥協的解決，或是和平本身是可以求得的時候，便會瘋狂的痛加攻擊。可是等到史太林和希特勒訂約以後，這張不法的人道報，却裝做它是受了壓迫箝制的樣子，從事純粹失敗主義者的宣傳來了，這種共產主義者的搖惑人心，對於軍隊是否有使士氣銷沉的影響，我們很難測知；不過，我想，在許多假裝工人的共產黨的軍火工廠裏，不用說，生產率是因此大大的減低了。

由上述看來，法國是在軍事上，外交上，與政治上許多不利的情勢下開戰的。可是當時的情勢，也並不就是完全絕望。如果危機的可怕嚴重性，能够事前使全國人士普遍認識；如果有一個堅強的領導力量，像法國革命時期所發現的，能够半勸誘半強迫的領導人民接受巨大的犧牲，將全國變成了一座武裝的軍營，每個人必須過着斯巴達人一樣清苦的生活，法國一定可以有一個較好的機會——一句話，不

單是可以和戰前幾年來德國的努力競爭，也是和表面上看來異常平靜的宣戰後最初八個月的德國努力競爭一下。

可是這種堅強的領導人物顯然沒有。一種平凡而又愚笨的檢查制度。硬將大局的殘酷事實，不讓透露到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的耳朵裏，如果英美人士能够及早認出危機，或許可以促起更快與更有效的飛機與其他軍用器材的援助。當時法國政府的態度是這樣，無論怎樣：他們是儘有充分時間來打敗德國的。

法國拒絕將牛油變成大炮。在最後不幸的幾個禮拜之內，法國的麵食品比德國的要多得許多，祇是坦克車少了；法國有更多的精美的新衣服，而飛機就遠趕不上德國。誰都担心着她在關係國家存亡的戰爭裏，還是過着那麼優遊安樂的生活，怕要付上重大的代價，許多年的重大代價才行。戰勝的德國，會忍受征服的法國，過着比它自己更舒適的生活，顯然是不能想像的事。

現在要來判定個人與國家的責任，時間上顯然還太早了些。不過回想起來，英法交給美國的飛機與其他軍火的定單，竟是如此的遲緩，簡直是不能想像的。此外，還有過份信賴馬奇諾防線與封鎖效力的強迫觀念，可以節用黃金的信念，和既然那是一個長期戰爭，便儘有時間獲勝的思想。

列寧，一個比社會與經濟理論家更偉大的實行家，他曾告誡過他的信徒們，永遠不要「玩弄革命」——可是一旦接到決定行動的命令時，就必須竭盡最後一分的力量來戰鬥，這幾句話真是道出了一個最深刻的真理。這個原則，當然對戰爭也是同樣適用的。不過我就怕，法國就是犯了不大熱心打仗的致命錯誤，或是至少沒有將全國的人力與物力動員到最高限度所致。

後世的軍事歷史家，不用說，將來會將德法的武裝隊伍，重砲，坦克與飛機的實力，作一合理的正

確的對照表的。不過我想這還是不能說出戰爭的全部故事，或是解釋法國爲什麼那麼快就覆亡的。它必須同時計及某幾種心理上與道德上的成份。

打戰事開始起，我便看到民衆方面毫無熱心的表示。對於一般的法國人，這次戰爭是一個災禍——或許是一個不能避免的災禍，不過無論如何是同樣一個災禍罷了。輿論上一大部分是完全反對這次戰爭的——共產黨員因爲莫斯科方面命令他們採取這種態度，某幾個資產階級與守舊團體，則預見到一個長期戰爭的可能結果，暫且將戰爭的軍事問題擱起，一定會粉碎產業制度與破壞社會秩序。

這種反對戰爭的勢力，還沒有強大與有組織到可以造成任何公然反抗動員令的地步。不過那種悲觀主義，且不談失敗主義，則濃厚的瀰漫遍及於全國。我會在我的工作中間，到前線去走動過幾次，我在亞爾薩斯與洛林農家的軍官聚餐席上，在來去前線據點的長途汽車上，曾經和二十個左右的軍官，從將軍到副官談過。

這幾個軍官，沒一個豫料到即將來到的災難。不過也沒有一個是對戰後形勢抱樂觀的。誰都是預先看到普遍的貧窮，社會秩序的凌亂，發生新的問題與困難。我敢斷定這幾個軍官，在最後可怕的試驗來到時，每一個都是充分盡了他的職責的。不用說，有幾個還在這次實力懸殊的戰爭裏，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可是這幾個軍官心理上的態度（士兵們也不見得比帶領他們的軍官們更熱心一些），完全是野蠻民族衝破羅馬帝國邊界時羅馬將帥的態度。那主要是拜占庭將軍們的同樣態度，他們心裏感覺到：要和瘋狂的阿剌伯人或土耳其人抵抗，定然是一個失敗的結果。那完全不是法國革命時代擴張領土戰爭的法國兵士的心理上的態度。也不是那種能够努力反轉懸殊的形勢，那種能够將失敗轉爲勝利的心理上的態度。

法國，在這次短促而可怕的戰爭裏，爲了祇注意於保守與防衛，吃了許多心理上的大虧。這在精神上與物質上，全不配和第三帝國相抗衡，因爲德國舊時極有效率的軍國主義，現在重又被納粹的革命主義所燃燒起來了。

美國可以從法國的崩潰裏獲得什麼教訓呢？現在那個有真正價值的教訓時間，或許是很短促，異乎尋常的短促的。不過我想從法國的經驗裏，有兩件事情是極端顯著的。如果在心理上與物質上沒有最充分的可能的準備，而戰爭則完全倚賴着一個國家的自由意志時，那末就永遠不應該採取戰爭的生死存亡的決定。如果一旦發動了戰爭，就必須拿出全國最後一分力量，抗戰到底。一個國家必不可「玩弄戰爭」，必不可利用小刺激和情感的姿態，來替代現代全體性戰爭中所必需的堅決的奮鬥。（錫如譯）

拉丁美洲並不傾向於法西斯主義

John M. Vebber

本文內容，可說與本刊第十七期所譯載『希特勒覬覦下的南美』一文剛好相反，但因此正可以互爲參考。原文載『現時代』（Living Age）月刊九月號，作者曾旅居南美多年，前在美國外交部供職，現任紐約『合衆通訊社』拉丁美洲部編輯。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個溫暖的冬季薄暮，一輛載滿義國巡洋艦“Duca a Aosta”號及“Eugenio di

Savona" 號上的水手的公共汽車駛過蒙得維迭奧 (Montevideo) 城市。水手們伸出他們的手臂，向一羣在人行路邊酒吧間裏喝東西的人行了一個法西斯敬禮。這事情所引起的騷亂使他們明白了極權主義在烏路圭原來並不得民心。

這不是一個僅見的例子，而是拉丁美洲典型的情緒。此事像以前及以後的別種類似表示一樣，說明了拉丁美洲民間的精神，並顯得與一般對南方諸共和國之民主主義前途所抱的憂慮實相矛盾。

過去五年中，會有不少紛亂的謠言，說什麼歐洲極權主義理論正在向新大道諸拉丁國家傳播，但並不能證明此類理論確已被人接受。反之，那些地方卻對之用各種方式作了顯著的抵抗。他們在此次戰爭中對聯軍方面有一種普遍的同情，其主要因素厥為一般人對外國的極權主義所懷的惡感——拉丁美洲以爲聯軍是「爲了民主主義而戰」。

就政治的意義講，拉丁美洲人民像北美人民一樣，是根本上傾向於共和主義的。這是當然的事，因爲除了巴西及墨西哥外，他們在百餘年來均未見有別種形態的政府。連巴西帝國亦早在五十年前以彼得羅第二 (Dom Pedro II) 之傾覆而結束，墨西哥帝國亦僅能多支持了三年，共和國又告恢復。幾次革命雖曾妨礙了拉丁美洲國家之內政發展，但仍未曾影響到他們的共和政體。他們對民主主義的解釋也許與美國不同，但歐洲傳來的意識於政治方面對他們也像對美國一樣的格格不入。

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治乃是在本地生長的變種，不能與歐洲的主義混爲一談。幾乎從脫離西班牙而獨立時起，它在許多國家中已成爲政治結構中之一部分。但它卻極少能够持久；而且憲法雖常暫時停止生效，但卻幾乎絕無例外的於政府改動時即恢復了。那些獨裁者之所以能獲得權力，當然有種種原因，但他們對歐洲的政治商標卻均連一點疏遠的關係都沒有。

拉丁美洲起初是用一種寬容態度來看法西斯主義的，以爲它祇是一種義大利所特有的東西，直至納粹主義興起，它纔被一般人視爲一種思想界的瘟疫。

全美洲對於極權主義的態度，已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於秘魯里馬（Lima）舉行的第八次汎美大會所一致通過的里馬宣言中明白陳述着。此宣言在序文中說：「美洲人民因其共和制度的類似，已達到一種精神上的統一，」且於詳述了泛美主義的原則之後又說：「……（二十一個美洲共和國）既均忠實於上述諸原則及其絕對的權威，乃願再度堅決表示彼等已決心支持並保衛此等原則，以抵抗一切能向之施行威脅的外國干涉及活動。」

去秋在巴拿馬城舉行的美洲外交部長討論會亦提及里馬宣言，並在一個單獨的議案中強調聲明保護民主主義，以抵抗那些「搗亂的意識」，並請參加會議諸政府採取必要步驟，「以便將足使美洲共通的民主觀念發生危險的理論逐出南北美洲之外，使之無從傳播。」

這並不是一個專爲顧全面子而設的決議，諸代表亦不是暗中吐吐舌頭將它通過的。這是「美洲精神」的表現，此種精神斷然反對歐洲思潮再浸潤到新世界來。拉丁美洲人民像美國人民一樣，均與歐洲有血統的關係，但將他們與舊世界束縛在一起的意識上的聯絡，却並不存在。

於諸新興共和國憲法草就時，一切與歐洲的政治聯繫就已切斷了。各國憲法均規定了共和政體，且均以美國的憲法爲模範。

最近公佈的兩種憲法，乃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的巴西憲法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的波里維亞憲法。前一種在第一條內即表明巴西是一個共和國，并表明「政治權力應出於人民且應以人民的名義來執行」。波里維亞的憲法則把國家稱爲「具有一代表制民主政府之自由獨立統一的共和國」。

若干共和國中國一些舊有的老政黨，它們就像美國的類似政黨一樣照着民族發展路線而發展；它們的政綱在若干大國中雖也受到黨派觀念的影響，但與歐洲的極權主義原則卻均是完全不合的。它們自己之間雖有意見不同之處，但於憎厭外國的『主義』一點，卻大家一致。

我們當然不能這樣的假定說：拉丁美洲諸共和國因為覺得它們已非常安全，不致受到極權主義勢力的侵入，所以它們就對此種威脅採取溫和態度。它們均知道大西洋與太平洋雖能使武裝侵略不易實施，但決不能阻攔思想的流入。因之，有許多人就想藉教育之力來與極權主義宣傳鬥爭。報紙加強民主主義的論調，學校則特別注重於教授本國史，用以消解極權主義的毒素。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美國雖在替拉丁美洲之政治前途擔憂，而實際上，從格蘭德河至合恩角的一大片地域，至今還沒有一分專宣傳外國主義的負責報紙。

教育運動在說外國語的學校及社團中進行得更為積極，因為在那裏，據說不僅外國兒童，即連土生兒童，亦受到與民主主義不合的宣傳。在這些地方，每天開始上課時均需唱國歌，而別處的學校及公共場所，則僅僅掛一面國旗而已。

但歐洲若干小國，因境內匿有『第五縱隊』而竟至亡國或被武裝占領，此事則頗使拉丁美洲國家受到深切印象。結果，許多國家即着手限制境內外僑的政治活動。阿根廷及巴西等國已封閉了一些政治團體，有些國家復加強對移民及游客的限制。

在幾個較大的國家中，也有一些團體會向極權主義送過秋波，但其參加人數極少，且未能發展。其兩個顯著的例子即為久被政府所認為非法的巴西綠衫整體黨（Integralists）及智利的國家社會黨。那後一個政黨曾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企圖奪取政權而未能成功，乃與左派人民陣線各政黨合作，在智利國會中

至今仍有代表。至於巴西的整體黨，則於一九三八年五月暴動失敗後，即未有所聞。

共產黨在拉丁美洲政治上亦未能占重大勢力。在多數國家中，他們的活動均是被禁止的，那些地方，下層階級於天主教的信仰頗為虔誠，所以教會就成了防止共產黨發展的一項工具。柏林與莫斯科的結納亦使拉丁美洲的共產黨活動受到損害。蘇聯之侵入芬蘭，更引起南方諸國的憤怒；在國聯大會堅持將蘇聯逐出的，也就是這些拉丁美洲國家。

極權國家的無線電宣傳，對拉丁美洲人民亦無多大影響。拉丁美洲人民中，祇有極少數購有能收受羅馬，柏林，及莫斯科短波播音的收音機；即連有此項收音機的人，他們之收受遠方播音，動機亦往往出於好奇而已。所以此種政治宣傳廣播實僅能影響極小部分的拉丁美洲人民。反之，德義兩國首都的廣播屢屢攻擊民主主義，這就引起一般的仇恨，致將他們自己的目的破壞了。報紙所載社論及讀者通訊，均能證實此種仇恨心理，且反映了拉丁美洲人民對此種攻擊已日益不能忍受。

最近在布威諾斯·艾勒斯發現有一羣老法西斯黨員正在組織徒衆以備與民主政治鬥爭，人們對於此事之無情的暴露，頗可視為拉丁美洲對此種搗亂陰謀之反響的一個例子。阿廷根的報紙公然譴責義大利人的此種活動，它們的社論對反民主陰謀大加攻擊，且引起了整個南美洲的反響。阿根廷外長霍塞，甘底羅（Jose Cantilo）下令查研此種法西斯黨的『反阿根廷活動』，並警告說他的政府『不能容忍在其國境內組織任何少數民族團體』。各地均舉行羣衆大會，重申信仰民主主義的立場，到場演說者莫不對各地的極權政治均一律否定。

有人以為拉丁美洲諸國，特別是東海岸諸國，極易成爲從歐洲來的武力侵略之犧牲品，這種看法其實錯誤的；有人相信它們缺乏人力與軍火，不足以抵抗對其海岸的攻擊，此種見解，亦同樣毫無根據。

阿根廷與巴西二國均能在短期間內召集起一枝極大的受過訓練的軍隊來應戰。此二國的軍役是強迫的（其它國家亦大都一樣）；它們人口雖少，但受過軍訓的十八歲至三十五歲之壯丁，說不定比美國還多。又，如有人侵入其中一國，則南美洲別國的受訓兵士一定會來幫同作戰，且最後又能獲得美國海陸空軍的聲援。

門羅主義本來有一種保護的意味，在平時，拉丁美洲人民聽了往往不甚舒服，因為他們覺得它雖能警誡歐洲，使之不敢向南美伸展勢力，但同時也是美國自己的帝國主義之外衣。較近時美國的干涉海地，陀米尼加共和國，及尼加拉瓜，就頗引起南美洲的疑慮。但羅斯福總統的睦隣政策則頗緩和了他們對美國動機的懷疑；到今日，一般均已能承認，如有任何拉丁美洲國家陷於被非美洲國家所攻擊的危險時，則美國於抵抗侵略者的幫助，就一定極為當然，而且又是毫無自私動機的事。（行節譯）

越南與荷印的華僑

關於越南的一篇，譯自七月九日日本的『都新聞』；關於荷印的一篇，則節譯美國『遠東調查』九卷十三期。

越南

現在的越南，已完全喪失其作為名實相符的援華最大路線之機能了。另一方面，廣西日軍又佔領了

憑祥，鎮南關，龍州等要地，達到了封閉中國邊境之目的。於是，越南之外面的援華性質遂一掃而光了。

但與抗戰中國相隣，素爲華人僑居經商之地的越南，乃在外華僑勢力與本國接壤的特殊地帶，這一層，必須加以考慮。

越南華僑之經濟力量，常握着越南實業之生命，而他們又堅決地擁護重慶政府，對於以汪精衛爲中心的南京政府，始終抱着強度的敵意，實爲不容否認之事實。

華僑在越南，佔着經濟上絕對的優越的地位。考其始末，遠在十五世紀，即開始有移民的事蹟。至於兵團的移民，則始於明末一將軍，因清朝政府的壓迫，乃率其部下七千人入越。華僑之出身地，大部分爲廣東及福建，他們一面渡海而殖民於海岸都市，一面遵陸從雲南廣西南下而移住於紅河盆地，及瀾滄江上流沿溪谷一帶。越南之於華僑，有着近乎理想的社會環境，其文化又是以模倣中國文化爲根幹的，故華僑在越南頗佔到經濟上的便利，而政治上亦受到法國政府特惠的待遇（按：華僑在越南方面，事實上也並沒有受到什麼特惠的待遇，這不過是一種誇大的宣傳口氣而已。——譯者）。華僑在僑居越南的外人當中，佔據着壓倒一切的多數。據越南官廳之統計，華僑居留人數，在一九三六年爲三十八萬餘。他們主要的是住在越南南圻，特別是西貢和堤岸兩地，共佔越南居留華僑之過半數。其餘的則分散於東埔塞，北圻，中圻及老撾等地。

法國於一九〇五年領有越南。當時華僑經濟之投資額的概算，已達九千七百萬法郎，農業資本比商業資本爲少，然仍凌駕乎法國投資額之上。目下華僑商業資本之狀態如下：

貿易業——越南輸出貿易之大宗爲米，自不待言，米之輸出佔商品輸出額之六至七成，但却操諸華

僑之手，且經常的和各地之華商都有着密切的連絡。至於輸入貿易，他們主要的也是處理經由香港和海峽殖民地等處華商而來的商品，至少每年總有五六千萬法郎的交易額，而日本輸向越南商品之六成，也是委托他們經手的。華僑貿易業之商品額，大約一年總要超過二十億法郎以上。

物品販賣業（經紀商人）——華僑之經紀勢力極大，小自小負販，大至大發莊，差不多都是被他們獨佔了去的。他們在越南，到處將輸入品乃至諸工業生產品，直接販賣給土人；同時又收買米以外的土人之生產品，向歐洲及本國輸出和經售。這方面的從業者的人數，恐怕要佔到越南華僑的十分之八的樣子。

金融業——華僑系銀行有「富滇」「東亞」二家，但却是不足輕重的。華僑間的信用，依然是寄托於法國及英國系的銀行方面。除了銀行業以外，則可注意的乃是貸金業。他們的貸付方法是：在無擔保的場合，則採取由連帶責任者以相當物品償還其貸金之方法；在擔保借款的場合，對於農民，則採取以農作物之收穫為抵押之方法。因為此種貸金業在無論什麼偏僻的地方都有，所以一般小民們賴此頗多。

地產業——華僑之地產散佈於南圻與中圻，及河內，海防，百囊奔等地。現在華僑之土地所有數為六萬二千公畝。

交通業——越南南圻之河川運輸，幾乎盡握於華僑之手。這是因為重要的運輸工具均為他們所有之故。

以上所述為越南華僑經濟勢力之概觀。但是，預測可有無限擴大之前途的華僑勢力，為了法國對於華僑政策之變化，土人之競爭，法國資本之進出，以及華僑之無視於機械文明等等理由，近年來，已到了漸顯衰退徵象的地步了。

華僑寄回本國之款，年達八九百萬。他們對於祖國之生產業投資頗大，並踴躍地購買國府發行的公債，他如對於社會教育，亦毫不吝惜地供給巨額的經費，且完全是一種義務性質的。（易士譯）

荷印

依照荷印政府一九三〇年人口統計，華人在荷印的，共一、一九〇、〇一四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二〇三。其中七十五萬是生在荷印的，其餘的五十萬則由中國移殖過去。如果再詳細分析一下，在五萬土生華僑中間，約有五十萬，他們的父親生在荷印，其餘的二十五萬的父親，則在其他地方生長，這許多年青華僑，大多還不滿二十歲。中國人的南進運動（大部分是華南幾省人），已經繼續了好幾個世紀，他們並且深入內地最隱僻的地方，與最遼遠的島嶼。他們在新加坡，婆羅洲西北部，邦加與勿里洞，廖內羣島與東蘇門答臘幾處地方，約佔當地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七。在爪哇是百分之十，在巴達維亞是百分之十六。

除掉蘇門答臘的華僑，種田，開礦與做侍役以外，大半都還是從事於商業活動。大約百分之三十七是商人，百分之三十一從事於原料的生產，百分之二十，從事於工業。服務於公眾事業的人數很少。土生的華僑，在陸上運輸業中，亦頗佔重要地位。

荷印華僑中間，識字人數達三十四萬五千人，其中約四萬人能寫讀荷蘭文字。在荷印土生的華僑，不識字的人數，要比在其他地方出生的為多。

在近幾年來，特別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荷印的華僑人數，增加得很快。在上述十年中間，華人每年的生產率是百分之四·三。上列數字，並沒有將暫時居留的勞働者與商人包括在內，原因是他

們很少有家庭。未成年的華童，在一九三〇年，較成年人要多出許多。即使現時沒有華人移殖進來，華人的增加還是很大。在一九三〇年，荷印華僑祇有四八七家，到一九三八年，已增加到一萬一千九百十四家了。（如）

特載

德國國社主義的幾個基本原理

（下）

Edward Benes

這種利害共同的觀念，這種集體的自覺是來自下面，來自人民的。這種感覺和大戰期間同一連的兵士的感覺相似；一羣從事共同工作的工人，一羣學生，苦工監裏的份子，一羣陰謀份子都有這種感覺。這種精神這種自覺是全民族的情操；是民族生活裏全部精神一切希望一切表現之所繫。這全民族共同的社會纔是真正的至尊的國家民族。

這至尊至上的民族是全民之主，一切應為它而犧牲；所有人民應為它而生，所有一切應為它而服務。每個德國青年應虔奉斯旨，不顧己身，以其生命貢獻民族，祇做一些有利民族，生長和發展的事。他應有古巴斯達青年的精神。

這便是國社主義社會權力觀念的所由來。我們已經說過，對於法西斯主義，國家便是一切權力的根源，而國家即等於民族。但法西斯社會權力的基本要素却是國家而不是民族。對於國社主義，權力的次

序是不同的，到某種程度是剛剛相反的。民族居於首位，國家祇是個次要的因素。政府和國家只是民族的框架，民族便在裏面生活，工作，發展。國家是件工具，可以配合，改造，增大，縮小；民族纔是原本的因素，是唯一永久的，不縮小的；它以國家爲工具，爲它的發展，優勢，文化，權力而奮鬥。

這種起源於「*Volkstum*」和「*Volksgemeinschaft*」的社會權力觀念，結局自然而然的要引到極權主義的路上去，正像法西斯主義的絕對國家觀念要得出同一的結論一樣。國家是至尊至上的民族共同社會的工具，國家執行民族社會所需求的一切。一切對於民族有利的便是對的，對民族無用的或有損的便是錯誤的。民族共同社會是一切生活，活動和政治鬥爭裏的最高元素——國家只是執行民族共同社會的意志；就這方面說，它便包抱一切社會活動，精神物質生活的各部門，包括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的一切機能。個人是完全附屬於民族共同社會的，是沒在社會裏的，他之所以有着價值和權利不是因他是個人，是因爲他是民族共同社會的一部份。

這些理論可以解釋國社主義的兩大觀念（這兩大觀念是國社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共有的）：

一 個人絕對隸屬於民族共同社會和國家的觀念。

二 在國社主義社會裏建立社會正義，建立較爲公平的新經濟機構，以利民族的觀念。就這方面說，國社主義是一種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它的社會經濟政策有許多原則接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正和法西斯主義一樣，這種接近可以解釋它對於這兩種主義的無情敵視。

我們還須解釋國社主義理論裏的一個最後的元素：「領袖」的觀念。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權力觀念是建築在 *Volksgemeinschaft* 和 *Volkstum* 的觀念上的，在一方面說，「領袖」的觀念也是以這兩個觀

念爲根據的，因爲只有通過它們我們纔能從至高的民族共同社會裏獲得至高的「領袖」，正似法西斯主義從絕對國家的觀念裏取得絕對「領袖」的觀念一樣。

國社黨「領袖」的權力不是從他的才智，德行，或偉大人格得來的。這種制度有着許多不合理性的和浪漫的元素，並從 Volkstum 和 Volksgemeinschaft 的神話裏取得許多重要的觀念，所以甚至「領袖」也是一個神話。領袖祇是一個「使命」；它是超乎自然的，不可思議的，性理上不可解釋的，不合理性的。「Führer」（領袖，元首），是民族的化身，是 Volksgemeinschaft 的表現。他並不站在民族和人民之上；他是屬於民族的，在民族裏面的，他是它的媒介。民族共同社會通過了他而表現自己；通過了他的力量和行動而生長，強大。要受這領袖的領導便要放棄自由，但這樣却增加了整個民族共同社會的力量。這些理論是和整個政權的膨脹政策和動力主義是互相符合的。

這種領袖和民主國家由大眾選舉出來的領袖不同。照納粹黨人的意見，國社主義的領導權不是由武力得來由武力維持的。領袖和他的數千百萬的隨從之間有親愛真誠的團結，他們被民族共同社會裏同一的精神同一的觀念團結起來。他們之間有光明磊落的關係。一方面領袖相信他負有特別使命，所以感到責任重大，另一方面大眾完全信託領袖，相信他能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表顯他們的情感，滿足他們的需要，並實現他們的願望。

三 國社主義的法律觀念

國社主義還有一些和我的題目——民主主義——有關，討論起來很有興趣的觀念和理論。我們一一討論起來就離題太遠了。但我無論如何必須抽出一小部份時間和篇幅討論國社主義的法律觀念，因爲它

也許可以表現當今德國政治和倫理的全部精華。

國社主義法律的殘忍不仁是世界無與倫比的。它對於國社黨的整個政權關係重大。依國社主義的哲學來說，人種和 Volkstum（民族、民俗、國體、國風）是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各種表現的根基，所以國社主義法律的整個系統也必須以這兩個因素為根據。照國社黨人說，各個人種各個民族自有其特別的法律，這是民族個性的表現，國情的表現。自由民主國家的社會是建在理性主義，個人主義的抽象思想瓦解思想上的，它的法律觀念正是這種思想的產物。國社主義認為這種適合全人類不分國情的抽象法律是有毒的，行不通的，不能存在的。

國社黨的法律學家為他們的法律觀念所下的定義有點像這樣子：對於國社主義，種族和 Volkstum 便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保護生命並鼓勵其生長的，保護日耳曼民族並鼓勵其發展，擴大地盤的；法律的目的在保存日耳曼種的純潔；法律只是一件有利於德國民族的東西。國社主義的理論家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他的著作《二十世紀的神話》（Der Mythus des XX. Jahrhunderts）裏，加上了下面的話：「對於我們，法律只是對於德國的光榮有所貢獻的東西。所以國社主義的國家只是這種法律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在執行法律，維護法律。自由民主國家的法律純粹是形式法律，它所根據的法律抽象觀念和人類平等的觀念是不存在的。」

這種法律觀念認政府獎勵優生學，改良人種，反對血統混雜，反對猶太人的活動是極為正當的，國社主義的全部法律理論以及它的種族神秘主義都為政治的排猶運動辯護，認它可以補充雅利安人為最好民族的總理論。

國社黨的國際法律概念是和這種法律概念有密切關係。的這也不過是一些用以為國社黨的外交政

策辯護的理論體系罷了。在這裏，「法律是有利於德國民族的東西」這個原則也一樣適用；一切國際行為必須以德國的利益為唯一的目標，它必須以民族的利益，生長和擴展為最高的標準。所以它是個純粹主觀的觀念，它排斥任何外來的和客觀的標準。日耳曼民族共同社會和它的利益便是決定是非的最後標準。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並加上某種原則上的限制，這種國內法律的觀念是可以想像可加以辯護的，但結果內政必走到極權主義或集權主義的路上去。在一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上，這種國際法的觀念是排除異己的，殘缺不全的，會引起國際無政府的狀態的。依照這種觀念，每個國家自有其本身的國際法律，它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他國的利益。因此，各種不同的法律必然要發生衝突，必然要排斥國際的組織，國際的法律，共同的權力，共同的法官，和一切足以限制國家民族至上權力的事物。

國際間既無仲裁的權力存在，各種主觀的國際法律便不能有何決定，因此必須使用壓力，武力，戰爭，和強者的權利以解決一切。國社主義的整個法律系統在國內便是極權主義，在國外便是強者的權利，戰爭的準備和暴力的統治。

我們必須根據這些理論判斷，當今德國的實際政策：在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的活動方面，德國的人民是完全服從的；出版，宗教，科學和藝術的自由是完全禁絕的；國家民族的全部經濟生活是要受一番有系統的計劃的；一切要受指導，一切都要為國家民族的利益着想。

栽培純粹民族的理論引起了排猶的法律；凡與民族精神不合的政見或宗教信條都礙難容許，所以要禁絕其他政黨，排除所有反對國社主義理論的宗教，排除有團體勢力的天主教和耶穌教。

向外發展的外交政策是跟着「民族、血統、土壤」的口號來的，那便是說，在一個領袖的指導下力

求帝國各部份民族和土地的統一；凡有日耳曼人居住的土地都算在內。國社黨會對全世界的日耳曼人施以精神的壓迫，俾雅利安人對於世界文明的發展能發生相當的影響，並分享世界的資源，進而完成雅利安民族的文化使命。國際的集體行動和國際的權力均被拒絕。國際聯盟被其排斥，因為它的議決案是以各國平等的原則為根據的；任何國際法律必定是討厭的，因為它限制了國家的至上權力。

幾個國家的集體行動既被反對，只可成立雙連條約的原則便被奉為實際外交政策的法則。納粹主義主張藉重壓力和宣傳與各國逐一談判，視業已變更的力量比例，視人口的生長和人口的需要而成立暫時的可以變更的協定，到它認為對德國無利時，協定和條約便不發生效力了。那時倘若對方不肯自動接受義務的變更，便以武力和壓迫將它改變。公開締結聯盟的目的不在防禦，不在維持現狀，反之，它的固定目的是在利用外交甚至利用戰爭以促成國際的變化，從中取得利益。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說：「國社主義運動不要做其他民族的維護者，要做自己民族的鬥士……我們不是弱小民族的警察，而是日耳曼民族的兵士。換言之，國家社會主義不欲維護一般的民族主義觀念，或屬於其他民族其他人種的某種權利：它只為自己的民族主義和自己的權力而奮鬥。」

羅森堡在二十世紀的神話裏說，「我們相信，有些民族的發展不致和日耳曼民族的進化趨向衝突……只有對於這些國家我們纔願支持其民族主義和其內部的價值。我們知道，在民族自決的口號之下，毫無價值的民族份子也可要求自由。但這一切不是和我們毫無關係，便只有在德國的遠視政策覺得利用它們可以增加國力的時候纔和我們有一些關係的。」

這便是德國國社主義法律觀念的大綱。我必須附帶說起，在過去三年間德國各大學和法科的教授都迫不得已放棄了教授法律的舊制，改採這些觀念作為法律思想的基礎。今日德國的青年均被灌輸以這一

些不合理，不道德，不人道的觀念。其它的法律理論是一概不准教授的。

好一些德國法學教授正從事著述，新法律學的巨冊一本一本的出版了，他們也許以為他們正在準備法律學的一個偉大的新時代，他們的成就便是法律科學的大革命。他們以淵博的學問貢獻目前的德國獨裁政權，自信對於民族的前途有莫大的貢獻。這些令人不敢相信的事體竟被目前的德國獨裁政權在文化，思想，和實際政治生活方面創立起來了。

這些簡略的事實便是我以為我們必須知道的，因為現在的德國法律理論支配了德國國社黨對內對外的全部政策。可憐到了今天知道的人還是很少，否則許多重要的政治家在過去數年過去數月裏和德國來往便不致犯了這許多驚人的錯誤。

在國社黨實際政策的最後階段中，德國的國際政策理論有時是依國際情形而加強了，有時是變弱了。譬如某個時期德國對殖民地問題曾經強調聲明，德國是根據列強權利平等的原則要求殖民地的。另一方面德國却對弱小民族說，她沒有剝奪他們的國籍的意思，他們的民族共同社會和 Volkstum 將被尊重；所以，我們常常聽到權利平等的呼聲，常常聽到德國尊重永久邊境的話（布里納 Brenner，阿爾薩斯 Alsace，羅倫 Lorraine 等地）。

這些公式和國社運動原來的正統原則有一些矛盾。所有這些公式都是應付實際政治上隨時變動的情況所必需的。這不能視作原則的變更或主義的發展。

像法西斯主義一樣。國社主義的精華是在它適應環境的能力，同時並不放棄整個主義的終極目標，所以這些公式是暫時的，最險毒的機會主義的公式。

祇就它們的政法手段和方法來說，它們實是政治史和政治學史上最殘忍最卑劣的唯物的馬基雅維里

主義和價世嫉俗主義。

這一些和原來的主義歧異的理論只是在它們有利於民族的時候纔被保存的。當它們對民族利益無所貢獻的時候，那純粹的基本理論便再發生效力，因為這纔是國社主義革命真正運動和真正的 Weltanschauung（世界觀，宇宙觀）。

維持着這一貫的政治態度，德國政府和這派思想家將絕不猶豫地違背自己的綱領，假若這事對於德國政府和民族有利。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危機當中，德國獨裁政權的魁首在柏林某次羣衆大會中公然向全世界宣佈說，德國已替捷克的日耳曼少數民族實現了民族自決的原則後，她不想將一個捷克人或斯洛伐克人包括在她的土地內。數星期或數日後，這個政府召集黨軍領袖開秘密會議，決定佔據純粹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地區，並在這土地上成立一個「德國的保護國」。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這國社主義的獨裁國家竟不顧在慕尼黑簽定的神聖誓約與兵侵略捷克，並分割了全國，自從那時候起，便對捷克斯洛伐克整個民族施以最卑劣的政治與文化的恐怖主義，並強它接受最殘酷的滅人民於使與德國同化的政權。

爲了這種手段，國社黨政權必須在國社主義的思想系統裏，找出一個新理論。機會來時，它便將再來借重純粹日耳曼民族的理論，完全尊重日耳曼民族底神聖權利的理論和日耳曼民族自決的理論等等。這個政權的性質和它底領袖的道德便是這樣的。

結論：法西斯主義、國社主義、和民主政治理論的關係

我想概括的檢討一下這一些理論對於民主制度底哲學和實踐的關係作為結論。

首先，關於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關係，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說：

一 兩個主義有許多共同的理論。兩個都是對於法美大革命全部哲學的反動，對英國憲政英國民主國會制度底傳統和觀念的反動。它們都是反理性主義的，反人道主義的，反平等主義的。——它們所根據的大都是直覺和本能的哲學，主意論和極端派心理主觀論的哲學。

二 它們雖用不同的公式，但有幾點彼此都很相近。彼此都用鬥爭的原則為基礎，這是推動生命並管制它底進化，它的延續，它底不斷變遷的唯一元素。在法西斯主義裏，它是在人民的鬥爭中，個人對大自然裏和世界裡底個人的鬥爭中表現出來；在國社主義裡，它決定人類社會的發展，並在人種的鬥爭，生長，和興衰中表現出來。法西斯主義裏的極權主義觀念是跟着和民族合一的絕對國家來的；在國社主義裏，人民的民族共同社會纔是至尊的，國家不過是從它那裏取得權力罷了。

在法西斯主義裏，國家民族底極端的功利主義是跟着生存鬥爭的觀念來的，是不信世間有適於各時代各民族的主義，祇信物質力量的結果；在國社主義裏，它却起於主觀的觀念；它認高等民族有使用種種方法以求本身利益和擴展的權利，認自己負有人類歷史的高等使命。

從上面所舉的例子看來，兩種主義間頗為重要的差別便顯出來了。法西斯主義雖是反理性主義反理知主義的，但它畢竟帶有一些拉丁的傳統：它是從較為普遍較為一般適用的一些原則出發的。國社主義却是多帶日耳曼民族條頓民族底特性的：它是從純粹主觀祇為德國民族利益祇為德國目標而設的一些理論出發的。

三 分別更為明顯的便是 Volkstum (民族)、 Volksgemeinschaft (民族共同社會)、 Blut und Boden

(血統與土壤)和Führer(元首)的觀念。這些是國社主義裏特有的，是帶有一種神祕性的——從德國的過去和德國或普魯士的精神裏得來的神祕性。

四 在實際政治上，兩個主義一樣反對歐洲和世界的政治秩序——這是建立於十九世紀的觀念上，建立於民主哲學和世界大戰上的。

至於國社主義的政治和哲理對於民主政治的直接關係，我們可說：

一 民主政治是大同主義，人道主義和平等主義的表現，是由理性主義和自然權利的哲學出發的；國社主義是反人道主義，反大同主義反平等主義的，它是民族的排外主義，是對民族平等理論的反動；它是一種主意論，是直覺和本能的理論，是德國對法英美底理性主義，理知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反動。

現代歐洲哲學的歷史是在兩個相反的哲學趨向之間移運的：一方面是各種色澤的理性主義，另一方面是直覺主義，本能主義，和所謂德國的「人生哲學」(Lebensphilosophie)以及它底活力論和達爾文進化論。在這最近幾年，在這次的戰爭未爆發前，第二個趨向在德國獲得極大的勝利，今日的德國便承受了它底重大的結果。這是兩派理論兩個世界的鬥爭，是國社主義在這鬥爭中獲得局部勝利的一幅簡單的圖畫。

國社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三本主要課本——一，布魯克的第三帝國(Moeller van der Bruck: „Das Dritte Reich“) ，一九二一年出版，希特勒自己的書得力於它的地方很多，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三，羅森堡的二十世紀的神話——都不過是以尼采F. Nietzsche爲代表的德國「人生哲學」底粗糙理論的新詮罷了。

二 整個人種理論和國社主義所根據的一切理論都是貴族的。它在原則上拒不接受對於所有民族所

有人種普遍適用的一切事物。這是國社主義底反民主教訓的第二個柱石。人與人之間人種與人種之間有社會鬭爭存在的觀念擯絕了以平等的原則和平解決一切的可能。

三 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和「民族共同社會」的觀念在邏輯的因果上必然的要走到國家極權主義，禁止個人自由，禁止宗教科學藝術自由的路上去，換言之便是禁止一切有民主政治色彩和國家絕對主義適成對照的一切東西。

四 國社主義的法律觀念，尤其是國際法律觀念，是極端主觀的，極端唯物極端不人道的，是有極端功利主義，極端馬基雅維里主義和反民主主義的色彩的。

總而言之，國家社會主義在人種的理論上是一種唯物的達爾文主義；在「民族」，民族共同社會和「領袖」的觀念上是引人入於歧途的社會神秘主義和非理性的浪漫主義；在法律的觀念上是極端排外極不人道的主觀主義和功利主義。將來總有一天它會被認作最不幸最慘酷的思想的，它也是使德國走到社會政治道德崩潰的路上去的。
(方炎譯·完)

本刊第十九期勘誤

(頁)	(行)	(誤)	(正)
一〇二	一	俄德	俄法
一〇四	一二	近親善	進親善
一〇六	一三	一部	一部分
一一二	二一	芬克	芬克
一二四	六	中中心	中心